

# 一代奇人王雲五(上)

(本文插圖刊第5頁)

●馬起華(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 金元券垮財長無辜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王雲五在財政部長任內發行的金元券(亦作金圓券)，是失敗的；但失敗不是王雲五的責任，至少不能由他負全責。

現代社會人人都是消費者，消費者必須購買消費品；購買消費品通常用鈔票。物價愈低廉，愈可多購物品；物價愈高漲，購買的東西愈少。所以物價和民生的關係太大了，這是去過市場的人的普通經驗，不必要經濟學家來說明。不過物價的漲跌，因素不少，而且複雜，所以物價指數，便成為經濟學上的課題。戰時及戰後，由於物資缺乏，而龐大的軍事費用容易造成通貨膨脹，於是導致物價上漲。抗戰期間，由於全國最富裕的地區及港口都被日軍佔領了，使得物資與稅收均受影響；而且戰爭吃緊，軍費支出龐大，法幣大量發行，使得物價大漲，政府乃採用限價及配給雙管齊下的方法來平抑物價，但效果是有限的，因為限價會引起囤積居奇，又因物資缺乏不能全面配給。

抗戰結束了，而戰爭並沒有結束。因為在抗戰時期坐大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勝利後，擴大內

戰，使已經疲憊不堪的國軍，必須和養精蓄銳的共軍作戰；使在八年抗戰中消耗得空虛的國庫，必須支應對共戰爭的大量軍費。加上共軍把全國重要交通要道破壞得肝腸寸斷，使得貨不能暢其流。在這種情形下，物價怎能穩定而不漲？關此，王雲五在他的自述中曾有說明：

『由於抗戰八年，繼以中共叛亂，國家在經濟與財政上大受影響。美國對我所予之援助，遠遜於受禍較淺之若干歐洲國家；於是幣值大跌，物價大漲，成為不可避免之事實。尤以糧食價格高漲，對若干地方發生搶米之風潮。中共與其外圍分子，更乘此散布不滿的種子，使我社會基層發生不穩狀態。因此，就表面而言，本年雖似較有進步，實則許多不安之因素，已預為蘊藏，待時而發，明年首當其衝，此後更不堪收拾矣。』

民國三十七年是一個關鍵年，它埋下了翌年大陸淪陷的種子。而在這一年改革幣制，做得不好，會加速大陸的淪亡。三十七年春，首次舉行國民大會，中共不參加國大，而展開全面叛亂。國大通過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戡亂是指用武力戡平中共的叛亂，於是與中共一場生死存

亡之戰便不可避免了。那時政府與中共是敵我矛盾，非鬥個你死我活不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打勝仗，尚可穩住民心，緩和物價上漲；不幸的是，戰爭節節失利，使物價如脫韁之馬，一發不可收拾。例如八月上旬，被共軍包圍的長春城內物價暴漲，經濟崩潰，燃料缺乏，竟挖柏油路面為炊。事實上，這年五月間，全國物價已經大漲了，王雲五就在這種情形下出任財政部長，正是受命於危難之際。他自述勉強出任財長的經過說：

## 洞察經濟崩潰危機

『行憲第一任內閣，閣最高當局早已屬意張(羣)岳軍君擔任組織。張君極力謙辭，並於改組前回籍省親，久留不返，以示堅決。於是考慮到曾任政院副院長及於張內閣中任資源委員會委員長之翁詠寬(文瀾)氏。據詠寬語余，他夢想也不會肩此大任，祇以行憲內閣久未產生，幾乎陷於無政府狀態，對內對外都不好，不得已始勉為擔任。他於三十七年五月奉命組閣，由我代表張院長交代，翁氏和我素稔，我曾於其組閣前後，表示還我初服的決心，他遂推薦顧孟餘氏為副院長。』

想不到他在一切人事大體已布置妥協後，突來訪我，堅邀我擔任財政部長，並言此為蔣（中正）總統之主動，他本來因悉我決心高蹈，不敢勉強，既經總統提出，他當然衷誠贊同；並因新內閣人事雖已大體就緒，但財政一席，如無適當人選，內閣還是不能成立。尤以蔣總統強調此席須由與金融界無關係而能大公無私者來擔任。經我極力推辭以後，他拉同我去見總統。當我和總統對此問題作最後一度的商討時，我連連日為此問題曾詳加考慮，遠者不說，祇說最近半年的國家歲出入預算，因我過去一年對於主持預算審核的經驗，以及對於物價增長率的推測，歲入之部無論如何設法增加，最多不過五百萬億元的法幣，而歲出部分，無論如何設法減少，在表面上至少須達一千一百萬億元。而決算時按照上半年的實例，臨時追加之歲出約當原預算歲出百分之一百五十五左右，是則下半年之實際歲出，無論如何不會低於法幣二千六七百萬億元。縱然歲入之部也可隨物價而稍有增加，但國家收入須經立法程序，無論如何趕不及物價之無限制地高漲。因此，半年間出入不敷之數，依上半年的實例推測，總在法幣二千萬億元以上。何況物價之高漲，係按幾何級數，愈在後期，愈速愈高，前途真不堪設想。半年間實際不敷之數達到幾千萬億元之巨額，這些不敷之數，惟有乞靈於印刷機器，則物價之突飛猛漲，自屬當然。國家一切開支又與物價互為因果，循環往復，伊於胡底。而且年終決算，姑暫不計，祇看不日便要提交立法院審議的下半年度歲出入預算，收支差額，表面上多至六七百萬億元，

其影響人心與物價如何，恐怕立時便難免發生物價的重大波動。我假使對於國家財政一無所知，或者還有勉為嘗試的勇氣，但我對財政實況不能不算明瞭，在此情形之下，委實不敢擔任，實以個人犧牲事小，而無補於國，可能因事態進展之不可避免，因而誤國，實在承擔不起。我這番話總算是具體而坦白，但蔣總統仍不肯放過我。他一面誠懇地安慰我，認為軍事好轉與美援發生效力，物價當不致像過去幾個月一般的狂漲。一面復切實表示，祇要我肯不惜犧牲，擔任此席，有何辦法，他定然極力支持。臨走時，我仍然力請另簡賢能。

### 決心自力改革幣制

「次日詠霓又來訪，力言總統仍堅決要我擔任。經過如是數度的勸與拒，我除了人情難却之外，又轉而考慮到第二個因素，就是由於我向來自量與不畏難的妄想方面。原來在張內閣時期，當美援發動之初，我曾極力主張美援應以協助我國改革幣制為主，因為國家收支，民間生產，無不因通貨膨脹而遭遇重大困難，我國復員之初，外匯充裕，正是可以改革幣制之時，既已失了良好的機會，目前為改善國家財政與促進生產，仍須以獲有穩定的幣值為樞紐；而欲使幣值穩定，莫如使無準備，無限制與不公開的發行，變為有準備，有限制及公開的發行。換言之，即籌措充分之發行基金，在有限制與公開的發行下，改革幣制。如此，則幣值可望較為穩定；同時輔以平衡國家收支的必要措施，並極力增加生產，節約消耗，則財政經濟始有改善之望。」

「至於美國其他方式的援助，縱然都與我國有利，但其有利的程度，總不如協助改革幣制之高；例如關於建設方面的援助，收效甚遲，勢難挽救危急萬分的經濟局勢。即物資的援助，固可協助收縮通貨，但人民對於法幣根本已不信任，縱能局部收縮其發行，但一面復因國庫之特別需要，繼續增加其發行，究竟收縮之部能否抵消增加之部，在無準備，無限制與不公開之幣制下，是不易保持人民信心的。因此，我在那時候，強調藉美國的幣制貸款而改革幣制；而且認為美國對於我國目前最有效的援助，莫如協助改革幣制的貸款。在張院長召集若干政務委員和關係人員的小組討論中，雖然也有一二人贊成我的主張，但多數人雖正面無法反駁我的理由，却總以美國未必肯贊成為慮，結果仍提出物資及建設的援助為主，僅令赴美代表從旁試探美國能否於物資及建設的援助以外，再助我改革幣制。本來請求協助改革幣制並不是容易成功的事，不過求援的國家，如果自己具有堅強的主張，或者還可得到美國的考慮；今我國對此問題，亦置諸次要，美國當然不予考慮，這已是不待交涉而已知其結果的。但我對於改革幣制的期望，從那時，實即比那時更早已前起，無時不存在心裏。當美援決定，並獲得我國赴美代表的報告，知幣制貸款無望後，我便轉向自力改革幣制，俟初步成功，再求外援繼續維持的方面。因此，當我對於財長一席固辭不獲之際，便不免又想到我這一年來對於改革幣制的主張，而由於素不自量與不畏難的癖性，更妄想假使在我掌握財政之時，能够達成此舉；則縱然

犧牲一己與變更決心，亦所不惜。想到這裏，尤其是經過去幾夜失眠的考慮，我在辭無可辭之時，便對翁院長說明，如果總統和他堅決要我擔任財長，我只允暫任三個月，苟無辦法，務請准我辭職，特先為聲明。翁氏對此聲明，並無異議，於是我的新任命便於五月三十一日頒布了。

『由於我對此新任命，根本就不願接受；所以在過去旬日之間，全副精神都集中在推辭，稍後也偏重於政策方面，絕未考慮到接任後應如何布置人事。等到最後不得已答應嘗試，任命即隨之而下。我為着不願妨礙政務之進行，一經應許擔任，便不再延擱就任的日期。』

### 高層首要集體創作

可見王雲五那時對於財政不但不外行，而且對於瀕臨崩潰的經濟，更是洞若觀火。在此種財經行將不可收拾之際，如果不改革幣制，則法幣愈來愈不值錢，政府愈來愈大量發行，如此惡性循環，人心愈來愈惶恐，當人民對於法幣的信賴感盡失，而視之為廢紙，經濟便全面崩潰了。改革幣制是對於病入膏肓的病人一副猛藥，實在是不得已的。不過王雲五主張改革幣制，並非他一個人想做就做，是歷時五旬，集合當時好幾位財金首長的意見，才決定的。他們一起去莫干山向蔣總統請示過，也在南京近郊雨花台一個秘密處所舉行高層會議，然後決定。八月十九日，蔣中正總統依照臨時條款的授權，發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要點是：

(一)「金圓券發行辦法」：規定以金圓為本位

幣，法幣及東北流通券均停止流通。法幣三百萬元，換金圓一元，東北流通券三十萬元換金圓一元。金圓之法定含金量為純金〇·二二二七公分，採十足準備制。金圓券發行總額以二十億元為限。對美金匯率，為金圓券四元合美金一元。臺灣幣准繼續流通。

(二)「人民所有金銀及外幣處理辦法」：公布黃金白銀及外國幣券國有政策，人民持有之金銀外幣，應於九月卅日以前，持向當地中央銀行兌換金圓券。

(三)「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資產登記管理辦法」：限令國人在國外存放款項，必需向政府登記，以便管理。

(四)「整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加強管制經濟，凍結物價，限定全國物品及勞務價格，按八月十九日標準，折成金圓券出售，不得變動。

### 軍事逆轉難挽狂瀾

發行金元券是以一塊金元券換三百萬法幣的比值去收回快要不值錢的法幣。可是金元券仍是貨幣，本質上仍不能使物價不漲，仍不能使它自己不大量發行及快速貶值。隨着東北及華北軍事的逆轉，人心惶惶，使得幣信動搖，大家搶購及囤積物品；加上軍費浩繁，使得通貨惡性膨脹不可避免，通貨膨脹受軍事失利的影響，情形如左表：

卅七年八月底二九六百萬元(共軍圍長春)  
九月底九五六百萬元(共軍攻濟南)  
十月底一、五九五百萬元(共軍圍錦州，蘇

北東台失陷，二十日長春陷，二十三日鄭州及開封陷，二十六日錦州陷，卅一日共軍攻瀋陽)  
十一月底三、二〇四百萬元(二日瀋陽陷，東北全失，十日南京戒嚴，二十三日保定陷，三十日徐州陷)

十二月底八、一八六百萬萬元(五日淮陰、淮安陷，十日全國戒嚴，二十四日張家口陷，三十日和談起)

卅八年一月底二〇、八二二百萬萬元(三日四川戒嚴，十四日中共提出和談八條件，徐蚌戰敗，二十一日蔣中正總統引退)

二月底五九、八六三百萬萬元(四日政府遷粵)  
三月底一九六、〇五九百萬萬元(六日共軍自平漢線南下，十三日共軍在長江北岸發動攻勢)

四月底五、一六一、一七三三百萬元(二十三日南京陷，二十五日太原陷)  
五月底九一八、九三九、九三八百萬萬元(三日杭州陷，十五日武漢陷，十六日共軍四十萬人圍攻上海，二十日西安陷，二十七日上海撤退)

通貨以幾何級數膨脹，物價亦相應的以幾何級數上漲，從而金元券亦以逆幾何級數貶值。其貶值可從金元券和美金一元的匯率變動看出：

卅七年	八月十九日原定	四圓
	九月	四圓
	十月	四圓
	十一月十一日改定為	二〇圓
	十二月	一二二圓
卅八年	一月	二四〇圓
	二月	二、六六〇圓

三月 一六、〇〇〇圓  
四月 二〇五、〇〇〇圓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上海失守，大局已不可為。金元券隨着大陸的淪陷而成廢紙和歷史名詞。國家的悲劇就是幣制改革的悲劇，即使讓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面臨兩種情形，也是束手無策的。其間固有人謀不臧之處，但大局如此，人謀臧不臧並不重要了。

王雲五在無可奈何中出長財部，本來只承諾做幾個月就要走路的，到了三十七年十一月，由於財政經濟緊急措施，作非他本意的變更幣制改革已無意義，他便引咎辭職了。

### 宅心仁厚字如其人

我於民國四十三年進入政大政研所碩士班，即選王雲五的現代公務管理一課，我那時興趣在政治理論方面，對於本課程並不重視。其後在政大博士班選王雲五的歷代政治典籍研讀，這門課要看二百本古籍寫研究報告的。但我却另外寫了一篇長達九萬字的研究報告「貞觀政論」，政大學報三期才刊完。後來在文大博士班，王雲五他是初試口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在五十九年及六十六年，曾兩度從他手接受學術獎狀。五十九年，王雲五要我為商務編幾部大書，接着要我擔任商務總編輯，每天向他請教有關選稿，出版事宜。前後二十五年中，有機會了解王雲五之為人，和看到他寫的許多字，因而有機會研究他的字和他為人的關係。

我對於中國書法有所研究，可是字寫得不高

明。我研究書法，是研究書法與人格的關係。研究這方面的學問叫做筆跡心理學 (Psychology of handwriting)、書相學 (graphology)、筆跡分析 (handwriting analysis) 或書相分析 (graphoanalysis)。這是從政治人物所寫的字結構、形態來研析他的性格、傾向及行為，並找出此人的字與人的關係。西方學者研究書相學大約有一百三十年的歷史，我國則以為最早研究者，始於民國五十年。

我研究書相與人格的關係，是基於二種原理：

(一) 字是人格的一種投射，是思想、感情、動機、觀念的一種表象符號。字為心畫，寫字要意在筆先，才能字為心役。惟心有主，官能不妄動，動則如意所欲出。人格有個別差異，也沒有兩個人的字是完全相同的。即使臨摹到家，仍有不同。人和字都各有體，也都各有個性。

(二) 寫字是一種身心活動，字往往隨身心狀況而改變。所以觀字可以知人。但影響字的變素很多。人格、練習、環境（影響個人的周遭環境及寫字當時的環境）、工具（毛筆、墨、紙、硯等）和字體（中文和西文大不相同）等，每一項都可對字發生影響，人格祇是其中一項變素而已；而且人格表現的方式很多，筆跡只是其中一項方式而已。因此，書相與人格的關係，不是一對一的。

(三) 若用精神分析學的人格三部分的理論來說，則狂放不拘、龍飛鳳舞的字，表現本我 (Id)；端謹正派，一筆不苟的字，表現超我 (Superego)；實實在在、筆筆周到的字，表現自我我

(Ego)。若就人格和字形的關聯來說，胖人字粗，瘦人字細，好人字正，壞人字歪，謹慎小心的人字緊湊，粗心大意的人字鬆弛；有藝術修養的人字美脫俗，無藝術性的人字不美；個性強者字剛硬，個性弱者字柔軟；聰明的人字巧，愚笨的人字拙；內傾的人字收斂，外傾的人字開放；情緒激動則字體不規則，情緒穩定則字體前後一致；身心健壯的人字有力，身心有病的人字無力（見拙著，政治心理分析，頁一四〇）。

我根據這三種原理來研析俾斯麥、威廉二世、梅特涅、墨索里尼、希特勒、興登堡、顏真卿、柳公權、文天祥、清高宗、左宗棠、翁同龢、林則徐、康有為、吳祿貞、秋瑾、譚延闓、戴傳賢、吳敬恆、毛澤東等政治名人的字和他們的人格，發現有極高的相關。

不幸的，我的字就是寫不好，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從我的字來研析我的人格，可能是因為我從十幾歲到現在一直就想把字練好，家裏有名人書法一大堆，都想練習，限於時間，未果。所以我不認為我寫字已經定型了，不能從字看人或從人看字。當然，我無所成就，算不上是名人，我和我的字的關係還不够資格作為研究的題目。而字寫不好，實在不方便，有些公文或書信，宜以親筆書寫為宜，往往因字不好，不敢獻醜。

由於字寫不好，過去對王雲五，不敢寫信，有事盡量面談，但對於他的字，則十分佩服，並有所研究。古人說：「人各有體」，就是說，由於人格有個別差異，因而字體也有個別差異。因此，各有各的寫法。寫字的人往往因自成一體而



成爲名家，很少以臨仿別人的字唯妙唯肖（這不太容易）而成爲名家的。臨仿別人的字是學習階段不可少的工作，但臨仿有了，便要隨個性而自成一體。孫中山先生的字業經名家評定爲上品，但沒有人知道他是學誰的字，也沒有記載他學過法帖。于右任氏說：「國父書法，以學力、思想、經驗通貫其間，古茂通潤，亦非有專事書道者所能及。」信手寫來，皆有唐人的活潑，而不失六朝的嚴整。」吳敬恆氏說國父的字，「特別的凝鍊」，「樸偉」。邵元沖氏認爲「總理平生未嘗臨池學書，而筆墨端重，胎息深厚，無潦草從事者。故時賢講總理之書，深得唐人氣韻，流美自然，非力學所能致。至其矜慎厚重，不詭不隨，又適如其人焉。」王雲五之爲人，不是幾句話可以抽象概括的。我現在舉幾件鮮爲人知或注意的事，來看王雲五是怎樣的一個人。

一、王雲五主持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許多大部頭書，可是都不是粗製濫造，內容都很精審，並不是以量取勝。他是一個非常忙碌的人，可是他寫作不輟，著作等身，他所編和所寫的著作書名卡，在政大圖書館目錄上佔了三個書名卡盒子，沒有一個作者所能望其項背。不過他所編所寫的書都是言之有物的，不是用字數湊起來的。

二、我在商務服務時發現某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書和本館出版的一本書，不但書名相同，內容也大部分相同，由於該書出版在本館那一本之後，顯係抄襲。我當即報告並提出處理辦法。事聞於該書作者，央請一位大牌的立委向我說項。我所定處理的辦法有二：①登報聲明該書係抄襲本

館的，提出嚴重警告；②由該立委出面，要作者向本館道歉，並保證該書立即停止發售。王雲五認爲第①種方式會把該作者（是一位教師）毀了，殺傷力太大，不如私了（即採第②種方式）。可見王雲五宅心仁厚，不忍心毀壞一位青年。

### 謀國忠誠不說秘聞

三、中樞遷台之初，的確作了反攻大陸的準備，「二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並不是口號，而是計畫；韓戰時準備出兵，軍艦升火待發，因美國政府的阻止（杜魯門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亦同時防止我反攻大陸）而作罷。王雲五告訴我，後來還有一次，蔣中正總統決心反攻大陸，並作了充分準備，却有兩位黨國大老竭力反對而作罷。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反攻機會了。這兩位大老是誰，我問了多次，王雲五始終不肯透露。他深識大體，若講出來，可能發生負面影響。其實我即使知道了，也不可能說出。王雲五從政幾十年參與機密大事甚多，知道許多政海祕聞，但他都不肯說出。因爲說了，並無好處，而且可能有後遺症，謀國之忠，應當如是。

### 胸襟坦蕩一笑化怨

四、民國六十八年，我因國內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都是授予外國人，不授予本國人，未免重洋輕己。王雲五無論對於學術文化及政治都有極大貢獻，乃發起簽署擬在政大校務會議提出由政大授予王雲五名譽博士學位。不料竟有受惠於王雲五甚多之人暗中阻撓，校務會議當天，尙未

開議，我和政大歐陽勛校長磋商結果，認爲若果提出會議，該阻撓人士作出對王雲五不利之批評，案子通過固無問題，但對於王雲五之傷害，不能不顧慮。於是決定暫不提出本案，而由歐陽校長在會議上公開口頭表揚王雲五之成就與貢獻。事後我曾報告王雲五，他一笑置之，並不問何人阻撓，胸襟何等坦蕩磊落。

### 具學術文化使命感

五、出版是一種文化事業，也是一種商業行爲。可是王雲五主持商務印書館，是把它當文化事業爲主，商業行爲爲輔。我在商務服務時出版了許多沒有什麼銷路的學術性著作，這是其他出版社不願意出版的。王雲五對於學術文化有一種使命感，這種使命感是透過他的研究、寫作和出版來達成的。

民國六十四年八月，王雲五八十八歲生辰，我在新生報寫了一篇短文「爲仁者壽」，說明我對他的觀感。文中說：

「參加慶祝王雲五師八十晉八華誕的茶會歸來，我心裏不免生出由衷的欣喜。因爲在這次茶會中，王師的精神比去年同日好得多。他講話的聲音宏亮，條理分明而極有層次；尤其他那慈祥、紅潤而始終掛着微笑的面孔，使得與會的人感到這是一種壽者相。像這樣一位數十年來爲國家爲社會爲學術文化而努力不懈並有極大貢獻的鬥士，是應該長壽的。王師在學術和事功上的成就，大家耳熟能詳，不想多說，這兒只記述我對於他認知的若干鱗爪。

「我對於王師，從小就耳食其名，說得是「久仰」。直到民國四十三年，進了政大研究所，才有機會當面受教。此後在我漫長的研究所生涯中，曾三度聽他的課，多次晤教，他並且兩次做了我的論文口試委員(其中一次任主任委員)，我的書又以前所主持的商務印書館印行者佔多數。

「初次上王師的課是「現代公務管理」。二十年前的我，正從事於政治哲學的研究，對於若干實務課程，意存輕視，也缺乏興趣。起初還認為像王師這樣有學問的人，不該主講這樣淺顯的課。一學期過去了，我才逐漸修正我的看法。原來這門課是科學管理和行政實務的結合，有其廣度和深度，非有王師那樣豐富的學識和經驗，是不容易講得好的。

「進入研究所後的第二年，我不自量力，憑着所學到的一點資訊，和比較有規模的思考，對於社會現象，得出「一切都是相對的」的結論。並推衍而寫成「社會相對論」一稿。敝帚自珍，攜見王師請益。承他在百忙中閱看一通，並致函張曉峯師，大力推薦。張師立即批交列入國民基本知識叢書出版。後因經費發生困難，上項叢書停止出版，拙作亦不克問世。只得把它濃縮為一長文，寄交香港出版的「自由學人」分期發表。該稿由書稿變成文章，誠有不幸，但王師的熱心獎掖，是令人感動的。

「王師所授「歷代政治典籍」一課，內容十分廣泛。要閱讀兩百多部古代典籍和筆記，撰寫許多報告和心得。上完這門課，才知道研究中國古代政治哲學的門徑和材料的來源，也不能不佩服

王師淵博的學識和驚人的記性。我在這門課中最後一個報告是「貞觀政論」，長達十萬字，王師為我作了一小序，由政大報分三期刊完。得了幾千元的稿費，添購了不少書籍。王師在研究所任課期間，曾先後應召出任考試院行政兩院的副院長。在他來說，擔任公職，不是做官，只是增加工作和責任而已，做了官，還是學者；在旁人看來，他在任上，看不出他是官，因為他一點官味都沒有；他辭了職，人們並不因而減少對他的尊敬，因為他的態度言行，還是老樣子。大家不把地位的高低、官職的有無，作為人際關係的尺度。所謂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對王師來說，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我而言，無意仕進，平時無論說話為文，除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外，大都少所顧忌，又好議論人的長短，評估事的是非；在王師面前，仍然如此。而王師未嘗以疾言厲色相加。子夏說：

「君子有三化(變者風貌也)；望之儼然(莊重也)，即之也溫(和顏悅色)，聽其言也厲(嚴正)」。前兩項對於王師是很恰當的描寫，但最後一項不够形容王師。因為他只有談到是非善惡的區別，斥責邪魔外道之非是時，其餘談話，都能入情入理，扣人心絃，加上他的慈祥 and 氣，真使人如坐春風。

「有人說，偉大出於平凡，還可補充說，偉大出於平凡，並超於平凡。這樣的平凡就不平凡了。王師苦學的精神，愛國的情操，和平易近人的風采，還可說是平凡。但他有常人不可及的不平凡處。直到八十五歲以前，他每天下午八時就寢，翌晨三時起床，在別人上班上學以前，他已經利用環境最寧靜、頭腦最清醒的時際，做了許

多事了。當他七十歲左右時，曾和研究所同學一塊兒登山賦詩，逸興盡飛，豪氣干雲。他在八十二歲以後，一口氣寫了兩大套十三大本思想史的鉅著。這都是常人辦不到的，這是他的不平凡之處。許多人都尊稱他為雲老，但他除年齡外，一點也不老。他那四通八達的頭腦，他那新穎獨到的見解，他那秩然有序的談吐，他那與病魔搏鬥、與命運挑戰的精神，都證明了他的不老，和他同年歲甚至比他年輕的人，誰不承認他是健者？

「目前高等教育，有教師和師分離的情形，因此言教者不必身教。師生之間，往往只有講課聽課的關係，下了課，各走各的。王師却不同。他是一位教師，也是一位人師。他那為學、做人、處世的風範，固足為後生的楷模，而傳道、授業、解惑的工作，則不限於課堂之內。他告別了杏壇，但同學們並沒有告別他。還是常常去看他，時時為他祝福，年年為他慶壽。」

「愛國是最大的美德；愛國者是大仁者。王師過去八十八年的生命，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相穿插。每當國家憂患、民族危難之際，他無不挺身而出，擔當艱鉅。他所思所言所做的，無論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是對國家莫大的貢獻。他是一位仁者，仁者必得其壽。謹以此文為仁者壽。」

王雲五個性隨和而堅持原則；苦學自修而學識淵博，滿腹經綸；大處着眼而謹小慎微。所以他的字灑脫自然，隨意縱橫，不拘常格，從他的字可以看出他的氣度，他那從工作崗位到殲儀館的精神，可以透露出王雲五的治學、做事、處人的某種態度。(下期續完)



馬起華「一代奇人王雲五」插圖（文見 14 頁）

①王雲五（右）頒發嘉新學術著作獎給作者馬起華教授（左）。

②王雲五（中）與作者馬起華（左四）等人合影。

